

十一至十三世紀
蒙古史研究概況



石印

科學出版社



K311
50186/1
十一至十三世紀蒙古史研究概況

A. IO. 雅庫博夫斯基 著

魏 英 邦 譯

周 為 鐸 校

科 学 出 版 社

1959

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

Из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монголов периода XI—XIII в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3, стр. 31—95)

內容簡介

苏联科学院已故通讯院士 А. Ю. 雅庫博夫斯基的这一著作，基本上是一篇史料性的論著。它总结了十八世紀中葉以来欧洲学者（着重于俄国和苏联的学者）在研究蒙古帝国历史方面的情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它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評論。它分析了十九世紀末葉以前資本主义上升时代、其后帝国主义时代，以及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对蒙古史研究方面的影响，它評述了俄国和苏联的蒙古学家們在研究蒙古人的社会經济关系方面的成就，也坚决批判了资产阶級学家在这方面的一些錯誤观点，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級历史学家格魯塞的理論。同时，作者对封建制关系在蒙古人中間以及在东亚其它长期保持游牧生活和父权制氏族制度残余的各族中間的形成和发展，大胆而深入地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十一至十三世紀蒙古史研究概況

А. Ю. 雅庫博夫斯基 著

魏 英 邦 譯

周 为 錄 校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5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59年7月第一版

1959年7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2,600

书号：1819 字数：57,000

开本：850×1168.1/32

印张：2 3/16

定价：0.27 元

十一至十三世紀蒙古史研究概況

十三世紀初期的蒙古侵略在当时人和他們的后一輩人的意識上产生了那样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对蒙古人的研究几乎和那侵略同时便开始了。就在那不期而至的災难当中，亚洲及东欧人民用許多語言——阿拉伯文、塔吉克文、波斯文、俄文、阿尔明尼亚文、格魯吉亚文、拉丁文、波兰文、汉文、匈牙利文、德文等——留下了詳細的記載和故事：关于蒙古人的历次远征，蒙古人的战略，他們的軍事組織，他們的凶暴和大量的屠杀人們，毁灭人們的住所、整个的村落以至于城市，关于运河、菜园、田地、手工业作坊的破坏，关于蒙古入侵后的管理制度，关于蒙古人的风俗和生活等等。

很有意思的是，所有以这些題材写作的人，無論是被征服的民族中的当时人或他們的后一輩，除非作者本人正在为蒙古人服务，都不但記載了他們自己所亲眼看見的或从他們的父亲和祖父那里所听見的事变；而且，对这些事变也加以評論，并正确地評論說这种事变是受到外族侵略的人民所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

就十二至十三世紀蒙古历史学來說，无疑的它会发展成为一门广泛的和独立的學問，那末就不能把有关这时期的史料的研究——史科学——和对为了許多時間以后的科学認識而写成的历史著作的研究——历史学——分开。由此言之，蒙古研究史也应该开始于十三世紀正当蒙古侵占亚洲和后来又侵占东欧的时候。不过，在数量上史料部分所占的位置，使历史学部分很容易在其中被淹沒。上述見解也迫使我們轉用到从十三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蒙古研究史上去，并从說明德基涅(De Guignes 1721—1800年)的观点来开始它。他的古典著作出版于1756年。^①德基涅是汉学家

^① 德基涅：“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鞏韃靼人通史”，巴黎，1756—1758。

傅尔蒙(Fourmont)^①的学生,他在革命前渡过了生命的一大部分,他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目击者,死于拿破崙統治年代。

十八世紀的历史学者們的特点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德基涅也不例外,虽然他执当时史学界的牛耳,是亚洲游牧民族历史学专家,他能直接閱讀汉文史料。但德基涅如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将社会制度发展本身解释得并不好。在他看来,民族只可分为二种,即“有文化的”定居民族和“无文化的”游牧民族。他将历史发展解释成仅仅是政治事变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交替。可奇怪的是,尽管他帶有十八世紀的反历史主义观的色彩,他却知道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而这些問題實質上导致了欧洲学术界对亚洲内部游牧社会进行科学研究的开端。德基涅在叙述蒙古历史之前,先在他那当时值得称为名著的“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人通史”第一册内叙述了匈奴和突厥的历史。

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点最为重要,那就是他說明了蒙古人如何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問題。这个引起了世界上的大变化和后来組成了“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最大帝国的民族,决不是文明的民族,也不想宣揚其法律的英明;他們是野蛮人,他們侵略到极远的国家,目的只在于搶掠一切財富,奴役各族人民,并使其恢复到野蛮状态,而使自己的名字变得可怕。”^②在十八世紀,广大的知識界自然知道,亚洲和东欧的各族人民在十三世紀遭受了蒙古的侵略,这是最大的災难。

把十三世紀的蒙古人視作在被征服国家内进行极大破坏的侵略者,这是資产階級史学正在发展时期的观点。我們將从下面叙述中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当帝国主义业已誕生,資产階級历史学思潮走向衰落的时期,这种观点才开始在資产階級历史学各方面有了修正。

上面已經說过,德基涅精通汉文和阿拉伯文(从1757年起,他就在巴黎充任叙利亚語言教授),因此,他可以直接参考广泛的原

① (布留沙尔)“百科全书”第三册,1839年版,第57頁。傅尔蒙(E. Fourmont, 1683—1745)——譯者。

② 見德基涅:“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人通史”第3册,第2頁。

文史料。至于其他文字的史料,他只能参考翻譯作品。

他的“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人通史”实在是科学中的第一部东亚游牧民族史。該书把从匈奴时代到鉄木儿王朝一个长时期内在游牧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重要事变都一一加以极詳尽的叙述。因此,德基涅的书虽然已經有些陈旧了,終究还是一部对历史学科很有用的书。德基涅的基本观点,曾經不只一次地引起了俄罗斯东方学者們注意。对我们的目的最有意义的,則是伊諾斯特兰采夫(K. A. Иностранцев)教授和在他以后的別尔恩什达木(A. H. Бернштам)的意見。

伊諾斯特兰采夫在他的“昆奴与匈奴”(Хунну и Гунны)^①一书中写道:“这个学者(指德基涅)在对中亚細亚^②各族的基本分类上采取的不是把某个族归入某个民族学集团,而是采取了政治上的划分。因之,德基涅沒有找到突厥人和蒙古人之間的本質差別……他将所有在亚洲这一部分領土上居住的民族,通称之为韃靼人,而只把他們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随后,伊諾斯特兰采夫談到有些学者們认为蒙古起源于匈奴及突厥的学說是德基涅創造的。为反駁这种对德基涅所发生的誤解,伊諾斯特兰采夫写道:“在閱讀他的著作后,我們作出了这样的一个結論,在我們这个問題上,他曾說明了下列两点:1) 昆奴是游牧社会的国家,以后在它基础上先产生了突厥国家,然后才有了蒙古国家;2) 阿特拉的匈奴人^③是指迁移到西方来的昆奴国家一部分居民的后裔。”

伊諾斯特兰采夫肯定說,德基涅和他的同时代人还没有民族学和語言学的科学知識,因为在那时候这些学科还不存在。德基涅的观点在實質上归納为:許多內部結構相近的(在時間上很少有

① K. A. 伊諾斯特兰采夫:“昆奴与匈奴”,1900,彼得堡出版,第6頁。

譯者按:我国古代史书內只有“匈奴”而无“昆奴”一名詞,西方史学家著作內对“匈奴”一詞有数种不同的譯音,“昆奴”即“匈奴”譯音的一种。

② 伊諾斯特兰采夫所指“中亚細亚”一詞,其范围較現時我們所通称者为广。

③ 阿特拉(Аттила)是匈奴部落中的一个酋长,于441—453年間率部族侵入欧洲,由东欧进入西欧法国及意大利境內,所向无敌,匈奴之名遂为欧洲人所惧服;因之,在古代欧洲民間文学中对匈奴有各种神奇傳說。——譯者

变化)部落,在它們合併到某一个政治集团时,就采用了某部落的名字。伊諾斯特兰采夫把德基涅对游牧民族起源的这种概念称之为“政治上的划分法”。

別尔恩什达木在他的“从六世紀到八世紀时期在鄂尔渾河—叶尼塞河流域居住的突厥人的社会經濟制度考”一小册子中,完全同意伊諾斯特兰采夫对于德基涅的观点所下的評断。

上文已經講过,德基涅同种族主义的观点是絕緣的。同时,他当然不会具有我們所設想的“民族”(Этнос)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要知道,这个概念只能,也仅仅只能在馬克思主义思想的軌道上才能产生出来。作为一个历史思潮中还是反历史阶段的代言人(在他那时候还没有社会生活形态变化的概念),德基涅认为游牧社会的基础是不变的游牧集团——部落。从这种观念出发,则所有从昆奴到蒙古时代的社会都是在完全停滯的状态中。尽管德基涅所发表的理论有这些很显著的缺点,但对18世紀中叶的科学有傑出的貢獻,他对后来的东方学家起着推动的和有益的作用。德基涅的功績更在于他在十八世紀中叶已向讀者們比較正确地介紹了那些从为建立蒙古国家而斗争的时期到鉄木儿时代之間所发生的主要事变。

德基涅之后,很久沒有繼承者来做他所成功地开始的对东亚游牧民族,特别是对蒙古民族的研究。几乎在七十年之后,即1824年,才出現了多桑(D'Ohsson)的伟大作品“蒙古史”,这书的第一册闡述了成吉思汗統治下的蒙古帝國的成立^①。

大家知道,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內,在法國和俄国,在思想战綫上发生了尖銳的階級斗争:在法国,有反对复辟和反动封建貴族的斗争;在俄国,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

① 多桑:“蒙古史”,巴黎1824年,第二版,共四册,1834—1835。

譯者按:多桑(Baron Constantin D'Ohsson)曾任瑞典駐柏林公使。其所著“蒙古史,自成吉思汗至鉄木儿伯克或达来尔兰”(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à Timour Beg ou Tamerlan)第一册,海牙,1824年出版;第二版共四册,巴黎,1834—1835年出版;第三版,巴黎,1852年出版。在中国,有馮承鈞譯的“多桑蒙古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館发行。

就是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当时年青的资产阶级历史学便在两地成长起来了。

我們想到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奥古斯丁·帖尔雷(Augustin Thierry 1795—1856年)和弗兰索阿·貴佐(Francois Guizot 1787—1874年)。在这些学者们的科学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就是说在貴佐于1830年7月革命后投向反动阵营之前的著作里，资产阶级的历史思想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祖籍是阿尔明尼亚人的伊朗学家多桑也属于当时这批先进的史学家之列。这时，在俄国，则有汉学家雅琴夫·俾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1777—1853年)，以他的富有科学天才的能力和質量很高的蒙古历史著作而出名了。

多桑代表着对蒙古和蒙古在中亚及西亚统治的研究史中的整个阶段。在法国，只有嘉特梅耳(Quatremère)①能以其关于蒙古历史问题的著作从質量方面来同他相较量。就嘉特梅耳拥有的資料而論，則無論如何还是不能超过多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多桑以后，西欧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在蒙古历史方面無論就其引用近东史料的广泛性或其思想的先进性而言，都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正因为这个原因，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曾于1925年评价多桑說：“在汉学家们的著作中还没有一种能够同多桑的著作稍稍比較一下”。②

自多桑的“蒙古史”第一版发行之后，已经过去一百二十五年以上了，但这书始終沒有失却它在科学上的价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多桑能正确的对亚洲和东欧历史中的蒙古侵略和蒙古时代提出评价。他在“蒙古史”第一册导言中，鮮明的描写了十三世紀前半期因成吉思汗军队的侵略性远征而造成的有害

① 嘉特梅耳(E. M. Quatremère 1782—1857)法国人，曾任法兰西学院閃米特語言(Semite)教授，于1836年将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Raslid-Eddin)的书的一部分譯为法文：“波斯的蒙古汗国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 Perse écrite en Persan)。——譯者

② 引自巴托尔德对符拉基米尔佐夫(В.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所著“成吉思汗”的书評。此书于1922年出版，柏林-彼得堡-莫斯科，格利日宾出版社(З. И. Гржебин)本，共176頁。书評見：“东方”(Восток)，第五卷，1925年版，第252頁。

的和毀滅性的結局。他寫道：“在十三世紀，亞洲的一大部分和歐洲東部地區曾為韃靼地區的各族所侵占和蹂躪。此時，歷來互相仇視的各个游牧民族和部落已集合于同一个旗帜之下。向外發展的形勢好似一股奔流湧向各國，他們從那里虜走豐富的財物，那里洒遍了他們的鮮血，到處成為廢墟。統馭這些凶殘和強暴的寇羣的人，起初只不过是若干貧苦部落的一个首領；這些部落曾經流浪在貝加爾湖東南地方的鄂嫩河(Onon)，克魯倫河(Klrouleu)及土拉河(Toula)等水發源處的高遠的深山里。在由於許多蒙古的部落首領和王公們覬覦功名而引起的流血鬥爭中，上面提到過的名叫鉄木真的首領，在他命運經受意外變化之後，終於消滅了他的几个對手。當他使大部分蒙古部落服從以後，他便順利地征服了韃靼地區的其他部族，并自稱皇帝，以成吉思汗為號。^①

“他(成吉思汗)不願象向中國北方的皇帝納貢的韃靼游牧部落那樣做中國北方皇帝的藩臣，而率領人數众多的騎兵突破了這個帝國，一直蹂躪到黃河兩岸。他俘獲大批的戰利品之後又為了去作別的侵略而離開中國。他降服了中央亞細亞，毀滅了特蘭斯奧克西安。亦名河中省(Трансоксиан)^② 呼羅珊(Хоросан)^③ 和波斯。他的軍隊一方面繼續侵略中國，另一方面，則掠奪了印度河(Sind)^④ 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⑤ 的兩岸，橫穿格魯吉亞達到黑海北岸，侵占了整個克里木半島，蹂躪了俄羅斯的一部分領土，

① 成吉思汗來自突厥語“騰格斯”(Tengis)，意謂海洋；亞洲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君主多喜以海洋的闊大自喻，如達賴喇嘛的“達賴”乃蒙古語海洋之意。——譯者

② Transoxiane 為古代地名，意謂在 Oxus 河以東地方；Oxus 即現今的阿姆達里亞河(Amu-Darya)，源出帕米爾高原，流入咸海(Arel)。Transoxiane 約在現今的布哈拉共和國。——譯者

③ 呼羅珊(Khorasan)為地名，即波斯東北部一帶地方。多桑原文則寫作，Khorozme，似與 Khwavezm(花刺子模)音相近。按花刺子模為古代國名，其領域不只包括呼羅珊，并波斯全部及里海外省(Transcaspieh)境地而言。此二名詞是否有同一來源，尚待考證。據多桑原意則應為呼羅珊而非花刺子模，因在文中提到花刺子模時，則不能同時提到波斯。在馮承鈞所譯“多桑蒙古史”內則寫作花刺子模。——譯者

④ 印度河(Induo)，亦名森德河(Sind)。——譯者

⑤ 幼發拉底河發源于土耳其，經敘利亞和伊拉克而流入波斯灣。——譯者

并进攻保加利亚人^①于伏尔加河的上游一带。”^②

这位用法文写作的史学家多桑的这些正确而色彩鲜明的話，有什么可以非議的呢。柯茲明 (Н. Н. Козьмин) 在多桑的“蒙古史”第一册俄譯本的序言里用不着写这样的話：“多桑以后的历史学家們(假使可以这样称的話)，曾把对蒙古和成吉思汗王朝所持的否定态度庸俗化了”。^③ 柯茲明的看法是錯誤的；不管有意与否，他在评价亚洲历史中的蒙古时代上，陷入了十九世紀末帝国主义时代才对本問題开始形成的反动观点的深渊里。

很突出的是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如同在十九世紀上半期一样，那时，资产階級还正在上升，资产階級科学也还是一种进步力量的时候，对成吉思汗、蒙古侵略和蒙古帝国的观点是正确的，并完全合乎十三世紀上半期曾經遭遇了这些大灾难的人类所留給我們的那种印象。而多桑就是十九世紀初这种进步的资产階級历史科学最显著的代表人之一。

不过，多桑不仅仅是在对亚洲历史中蒙古时代的正确观点上表现出是一个博学的历史家。多桑还精通波斯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的史料。这些史料对十三世紀、十四世紀的蒙古历史学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多桑曾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史料，引用了正确的史实，因此，他的“蒙古史”确实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直到現在，当多桑所利用的波斯文史料还没有完全譯成欧洲語言时，他的“蒙古史”对不識东方語文的人还是一部必需的书。多桑对历史的編纂和写作有很大才能，他曾很精密細心地对史料下过工夫，这使他的著作具有很大的价值。不过，多桑在当时还没有可能去参考蒙古史料，特别是(元朝)“秘史”(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因为在他写“蒙古史”的时候，这本书还没有翻譯成任何一种欧洲語言。

① 按古代的保加利亚人与現今的保加利亚民族同名而非同一种族，古保加利亚人居住于現今的俄罗斯东部的喀山城南一带地方。——譯者

② 多桑“蒙古史”，第一册，导言1—2頁。

③ 多桑“蒙古史”，第一册“成吉思汗”，由柯茲明教授譯成俄文并加序言，1937年，伊尔庫次克出版。引文見XXVII—XXVIII頁。

事实上，多桑是第一个利用拉施特·哀丁^①的第一册书中对于研究十二世纪蒙古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解决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国家的形成问题极有价值的资料的历史学家。这方面已是多桑很大的贡献。如果再注意到，多桑能够在拉施特·哀丁所作关于蒙古人的极丰富而复杂的综合记载中找出线索，能够区别出真正最本质的和经过批判而可信的东西，那就不可能不惊奇他的工作能力、洞察力和批判的敏锐性了。

当然，多桑是他那时代的人物，他还不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所认识，因为他不知道阶级矛盾是历史演进的动力的学说；所以，我们也就不应当要求他揭开蒙古国家形成的真实原因、它的阶级特性以及科学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评定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之间的蒙古社会发展的水平。在多桑看来，成吉思汗的国家是在各个部落首领们之间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些部落酋长们，企图在损害其他象他们一样的游牧领主的利益上，扩张他们的牧地和增加他们所管辖的人数。

在这时期，蒙古游牧人民之间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蒙古贵族们怎样为了最高统治权而斗争，“那可儿”们（Нукеры）^②在这里曾起过一些什么作用，经历着原始公社制瓦解的最后阶段的游牧社会内正在加速的阶级分化一般又怎样地进展——所有这些问题，自然未曾而且在马克思以前的关于历史动力的观念的水平下也不可能在即使象多桑这样的大研究家—史学家的面前提出来。很自然地，多桑“蒙古史”第一册内阐述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家的形成的各章只涉及到纯粹外部的事件，仅仅谈到政治问题，缺少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第一册内叙述蒙古侵占中亚细亚、伊朗和南高加索的各章，在1898—1900年间巴托尔德的巨著“蒙古侵略时代的土耳其斯坦”一书出版以前，就是说在以前的七十五年，乃是有关

① 拉施特·哀丁（Rashid-Eddin 1247—1318年）为波斯哈马丹人，曾充蒙古伊儿汗国合赞大王王廷国务大臣，著有“历史大全”（Djami-ut-tawarikh）。——译者

② “那可儿”原为蒙古部落酋长们的亲兵，后渐擢升为贵族，他们在部落内的政治地位相当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译者

这个问题的优良著作。这几章之所以到现在还使读者们感到惊异的，不仅在于它的叙述明了、史实丰富，而且由于它对于各种局部问题提出很多细致的见解。

多桑的主要作用并不体现在他著作的第一册上，因为这册中的几个内容已经被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所超越了。多桑著作的第二册和第四册到现在仍保留了较大的意义，但并不是说这两册比第一册写得更好，而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几部著作能够胜过多桑的书而完全代替了它。

诚然，多桑在一系列的局部问题上落后了，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按照现今科学的水平很深刻地和完全地解决了。但是，其必要性还未消失。至少，多桑在他的学术范围内遗留下了广大的遗产和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象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可能总的归结为蒙古社会史的问题及说明十三世纪蒙古侵略成功的原因。直至经过七十年之后，这些问题才获得了解答，特别是在巴托尔德、符拉基米尔佐夫和其他苏联学者的著作之中。

多桑是杰出的俄罗斯东方学者弗连（К. Френ）、雅琴夫·俾丘林和萨维列也夫（П. Савельев）的同时代人。弗连并不是专门研究蒙古史问题的，他没有写过蒙古史上的题目，他首先是一位阿拉伯学专家和古钱学者，他是俄罗斯东方古钱学的创立者和极有权威的代表。他的论述金帐汗国的古钱学的著作特别精彩。金帐汗国的钱币，对他来说，意义不只是因为它是纪年学上的、即确定政治事件和文化因素年代代表上的（考古学综合资料的日期）最可靠的资料，而且是因为它是研究钱币在金帐汗国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最可靠资料。

弗连熟悉在他那时候所有的东方学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著名的金帐汗国历史学家，他对蒙古侵略在俄罗斯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有极坚定的看法。他将他的观点明确地表述在笔记中，后来于1832年他把这笔记作为他建议科学院征求关于金帐汗国历史论著的附件。关于这问题，弗连曾写道：“蒙古王朝在我国名之为金帐汗国（Золотая орда），回教徒名之为朮赤-兀鲁思（Улус

джучь)①或成吉思汗藩邦德什特—奇卜察克(Чингизов Ханство Дешт Кипчакской), 蒙古人自己則称为‘托格馬克’(Тогмак), 它在从前几乎二百五十年間是俄罗斯的灾难和鞭子, 把俄罗斯加上无条件的奴隶鍊鎖, 将俄国王公們的王冠和生命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置。蒙古王朝的这种統治对我们祖国的命运、結構、法制、教育、风俗和語言应当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的”。②

凡是十九世紀上半期內的严肃的学者們, 在对蒙古时代史实的評價方面并不是犹豫不决的。

那个时候, 弗連的观点統治着历史学界。多桑和反动的卡蓝琴(Н. М. Карамзин)也持着这些观点。現在且看这位俄国历史家如何描写俄罗斯在經過拔都(Батый)行軍后的情形:“好象一条燃烧着的河流, 从俄罗斯的东部边界到西部边界一直浩浩蕩蕩地奔流过去了; 好象瘡疮、地震和一切自然的灾难同时从俄喀河(Ока)两岸到桑河(Сан)把它們洗劫一空。”③

弗連不只对他的学生, 而且对后一代俄罗斯东方学者有很大的影响。他也影响到对蒙古历史諸問題的研究。弗連曾用当时研究原始史料——手稿和古錢币学資料——的优秀技术和方法武装了年青一輩的著名的俄罗斯学者們写成的著作。象他那样負有盛誉和受到感謝的人在学者当中是很少見的。薩維列也夫写道:“弗連的名字是在历史科学界最无可非議者之一。作为一个精通阿拉伯学的专家、东方古錢学的創立者和权威, 弗連对于俄罗斯历史学也有很大的貢獻。在他生活在俄国的四十四年中, 他同俄国打成了一片, 他生活只是为了他的科学和为了把它应用于俄国。”④

十九世紀上半期著名的汉学家雅琴夫·俾丘林在蒙古历史学

① 朮赤—兀魯思在蒙文意謂朮赤(成吉思汗的长子)的国家。——譯者

② 見齐曾高曾(Б. Г. Тизенгаузен):“金帳汗国历史的資料集”第一册, 1884年, 彼得堡出版, 第555頁;第二册, 1941年, 列宁格勒出版。

③ 卡蓝琴:“俄国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1892年, 彼得堡出版, 第四册, 第10頁。

④ 薩維列也夫“关于弗連的一生和著作”, 彼得堡, 1855年出版, 第54頁。

研究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俾丘林按其正式职位而言乃是修士神父，他违背意志地留在僧侣界，但与宗教观念格格不入，他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和19世纪上半期的进步学者之一。^①

如上所言，俾丘林是多桑的同代人，按他的才能和学问的渊博来讲也是同多桑相等的人物。在那个时候，多桑研究近东国家的史料，主要是波斯文的。俾丘林则努力于中国史料的研究，在他这方面所知道的，据当时的专家们的意见，还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同他相比。且看和他同时代的、19世纪上半期的著名的东方学学者先柯夫斯基（О. И. Сенковский）^②曾如何地讲到他：“现在的东方学学者中还没有人能够象我们那个不知疲倦的汉学家雅琴夫神父，从东方文学的紊乱资料中揀取出有关东亚历史的那样多的新史实，那样多稀奇和重要的记载。”

华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6—1900）院士继承了俾丘林所开始的研究蒙古史的工作，他写到俾丘林时道：“我们曾经去世的那位汉学家的贡献是如此的广大，使我们感觉到，如果要在—部论述不只公众很少了解，而且科学界也还很少研究的事物的作品中，指点其难免的缺点，我们自己也未免太傲慢了。”^③

首先，我们应当把俾丘林的名字同蒙古人的族源的问题联系起来。在他以前，还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这样全面地提出来过。在“蒙古和其他中亚各国的关系概论”一文中，俾丘林写道：“古代中亚人民的历史虽然不能肯定地说明他们存在有多久和他们起源于

① 雅琴夫·俾丘林，全名为涅吉达·雅柯夫列维奇·俾丘林（雅琴夫）。关于他可参考别尔恩什达木写的俾丘林（雅琴夫）和他的著作“关于住在古代中亚的各族人民的报导彙编”。刊登在该书内的论文标题与该书原题相同。苏联科学院，1950年第二版，第5页。

譯者按：俾丘林（1777—1853年）或譯作夏真特（Hyacinthe），生于传教士家庭，少时攻读于喀山修道院，后任西伯利亚、伊尔庫次克的昇天修道院大修士；自1807年至1822年，出任第九希腊正教赴华传道团团长，后因对教务不努力，被调回俄国。他对汉文的修养，在当时俄国无出其右者；自1826年起，又任外交部翻譯官。

② 先柯夫斯基（1800—1858年），为俄罗斯最早的阿拉伯学专家。——譯者

③ 华西里耶夫：“从第十世紀到第十三世紀的中亚細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蹟”载于“俄国考古学会东部丛刊”（ТБО），第IV册，第1页。

何处；不过，从蒙古人与通古斯人和突厥人在語言的习惯和文法形式上的一些相似处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三个民族来自一个根源，无疑的，他們在距今遥远的时候就分为三支，即三个部落，因为大約是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中国历史上已經把蒙古和通古斯分为两个独立的族体了。”^①

根据上面引文可見，俾丘林肯定：1) 蒙古人、突厥人和通古斯人三个族有极近似之处；2) 他們来自同一根源；3) 很早以前，至少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时起，这三个族体就已經独立地存在了。

在今天，他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說法是不能令我們滿意的。俾丘林的推論的价值只在于他把关于蒙古人的族源問題提出，但并不在于它的解决。其缺点是在于毫无历史观，因为俾丘林认为蒙古民族是能够在几千年光景内在不变的状态下，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而存在。

在这同一本书里，稍后一些，俾丘林写道：“蒙古民族的来源与曾經从那里获得了民族名称的蒙古人的故乡，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蒙古民族的起源約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②；相反的，蒙古人的国家則是在公元九世紀初才产生，在十二世紀初才强大起来，而在十三世紀初奠定了蒙古帝国。”^③

俾丘林說这三个民族属于同一“根源”，究竟是指什么呢？他在格里戈利也夫 (В. В. Григорьев 1816—1881) 的“蒙古民族史”^④ 的书評中曾經对这个問題作了回答。他写道：“蒙古語言在文法上与突厥語言相似，許多字根亦互同，这明白地显示出，蒙古人在最古的时候是一个土耳其部落 (Турецкое племя)，但他們在离我們很远的时代同其他部落分开了，就在这远古的时代起产生

① 雅琴夫·俾丘林：“关于住在古代中亚的各族人民的报导彙編”，1951年，彼得堡出版，第477頁。

② 同一观点发表在他的另一部书“关于蒙古的筆記” (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远在紀元前2500年，这个民族游牧于邻近中国北部的沙漠地方”，見“关于蒙古的筆記”，第二册，第三卷，1828年，彼得堡出版，第一頁。

③ 同上，第483頁。

④ 見俾丘林对葛里戈利也夫的“蒙古民族史”的书評，載于“芬兰通报” (Ф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第二卷，1841年出版，第697頁。

了他們的轉變為另外一個民族；今天，他們在語言、風俗習慣，甚至一部分外表上和土耳其人(Турки)有所不同。”^①

在俾丘林看來，土耳其的人(Турецкий)和土耳其人(Турки)，並非是指“奧斯曼-土耳其人”(Турок-Османь)而言，而是指中央亞細亞和中亞的“突厥人”(Тюрки)而言。因此，俾丘林視“突厥人”為“根源”，並由是提出的蒙古人起源的理論就是突厥起源論了。自德基涅以來，即自第18世紀下半期以來，這些觀點在歐洲科學界傳播得很廣。

不過，關於俾丘林對昆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種族起源問題的观点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在與俾丘林同時代的布留沙爾百科大字典內，在“德基涅”一名詞之下可以讀到，德基涅關於昆奴和阿特拉的匈奴是一回事的理論“現在仍為所有的東方學者保留着，他們都肯定地相信，特別是根據雅琴夫·俾丘林神父的那些出色的著作而相信，匈奴(Хюн-ну)^②是純粹的蒙古人，只是他們並沒有住在蒙古地方罷了。”

在蒙古學方面，他出版於1829年的著作：“成吉思汗族最初四汗史”^③有更大的價值。直到現今，這部書還沒有失掉它的科學價值，因為在這部書里包含着從漢文編年史“通鑑綱目”^④譯出來的豐富史料；據漢學家的評定，這個譯文幾乎是無可非議的。俾丘林的書比多桑的著作第一冊的第一版還晚出了五年，當時多桑的書尚未獲得廣泛的流傳，俾丘林的書就表現出可與多桑的書並駕齊驅，因為二者研究的是同一個題目(成吉思汗蒙古帝國的形成)。俾丘林的書是根據漢文史料特別是“通鑑綱目”和“元史”寫成的。獨具特點的是，雖然元史寫成於元朝，而且用的是漢文，但它所依

① 見俾丘林對葛里戈利也夫的“蒙古民族史”的書評，載於“芬蘭通報”，(Ф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第二卷，1841年出版，第699頁。

② Хюн-ну 乃匈奴的又一種譯音。——譯者

③ “成吉思汗族最初四汗史”一書中所指四汗為：太祖(鐵木真)，太宗(窩闊台)，定宗(貴由)和憲宗(蒙哥)。——譯者

④ 按“通鑑綱目”乃南宋時朱熹就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編纂而成，他把編年體史加以綱目；綱仿春秋，大書于上；目仿左傳，小書于下，成為編年兼紀事體材的史書。——譯者

据的却是蒙文史料，其中有“元朝秘史”。^①大家知道，多桑在写他的成吉思汗的政治传记时并没有利用这些史料；因此，读者要有两部当时的出色书籍，即多桑的和俾丘林的，才能对有关蒙古国家形成和成吉思汗侵寇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多桑在叙述与侵寇有关的事件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西方——中亚和伊朗，而俾丘林的注意力则完全放在中国方面。

在俾丘林的“通鑑綱目”俄译本未出版时；^②我们还得时常去参考他的书，虽然这部书如同多桑的著作一样对蒙古社会制度缺少分析。

俾丘林的活动超出了他的直接专业——汉学和蒙古学——的范围。如同其他许多为1812年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所养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代表们一样，他把深刻的民族自豪感同当时的先进思想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了。在争论俄罗斯科学的意义、它和西欧国家科学之间关系以及俄罗斯学者们用俄文写出自己的作品是否合理的问题时，他站在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文里，在讲到俄罗斯东方学者们也参加过的这次论战时，还要提到。

在当时（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的东方学-历史学者们中间最显著的和特殊的人物可能要推格里戈利也夫了。他精通许多种东方语言，其中有蒙古文；他遗留下了不少关于东方这样一些地区历史的著作，这些地区就是金帐汗国、中亚细亚及与它们连接的国家 and 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和我们祖国有极密切的关系。

格里戈利也夫真诚地忠实于俄罗斯的科学，并为它的成就而骄傲；在这方面，他并没有追随他的直接导师先柯夫斯基，而拥护雅琴夫·俾丘林。他对俾丘林所作的关于蒙古和中亚的历史的研究曾给以极高的评价。

① “元朝秘史”或作“忙豁仑紐察·脫察安”（Monggholen niucha tabchiyan），于元仁宗时，自蒙古文译成汉文，附以音韵；原本今已失传，为蒙古历史史料中的最可信而有价值者。——译者

② 俾丘林的“通鑑綱目”俄文译本手稿，现保存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档案内。